

前言

| 在世界大變局之時重新思考全球化

那些使和平改變成為不可能的人，必將使暴力改變成為
不可免。

——約翰·F. 肯尼迪

2000年上海美術館舉行的上海藝術雙年展上，國際知名的中國藝術家黃永砅創作的一座雕塑吸引了眾人的注意。黃永砅用沙子堆出了一座和外灘上曾經屬匯豐銀行的那座著名大樓一模一樣的沙雕。這件獲獎藝術品有個諷刺性的名字，叫“沙的銀行，銀行的沙”（見附錄插圖1）。它最深刻的特徵是它在展覽期間的變化：逐漸變乾，逐漸解體。

這個地標性建築複製品的垮塌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特別是隱喻了全球化的驚人影響和潛在的災難性後果。由英國的帕爾默和特納建築設計公司設計的匯豐銀行大樓1923年一俟建成，就成為外國勢力在這座城市中輝煌歲月的代表。¹大樓表面是壯觀的羅馬式建築，前門有3個花崗岩石拱，上方是巨大的穹頂。英國人曾經吹噓說，這座大樓是“從蘇伊士運河到白令海峽之間最精美、最宏偉的”。²20世紀上半葉，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在和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

都與這家國際銀行過從甚密（也向它借過款）。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四十多年，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在這座大廈裏辦公。³1996 年後，它成為另一家銀行——浦東開發銀行的所在地；這家銀行作為主要供資方，支撐了在黃浦江對岸的浦東地區，特別是人稱“中國曼哈頓”的陸家嘴地區的震撼世界的大開發。

近期世界上發生了不少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事件，有美國的“9·11”恐怖襲擊，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還有最重要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這些事件的影響共同證實了黃永砵對於日益互聯互通的世界所產生的災難性衝擊與後果的感受和恐懼。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危機，整個世界的日常生活與工作節奏突然被打亂，甚至戛然而止。國際航班、郵輪和其他遠程運輸大多陷入停滯。學校、工廠、商店、餐館、影院、體育場和其他娛樂設施統統關門。大多數國家也關閉了國門。中國最初暴發新冠病毒的“震中”武漢（一個人口超過 1100 萬的大都會）2020 年大半個春天徹底封城。世界範圍內，從新冠病毒肆虐之初到 2020 年底，大約 8370 萬人感染，超過 181.9 萬人病亡，數十億人被隔離，生活在孤立無援、焦慮緊張，甚至驚慌失措的狀態中。例如，2020 年 3 月，78 個國家中的 34 億人（約佔世界人口的 43%）在政府要求下“居家隔離”。⁴截至 2020 年 4 月，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迫使 191 個國家關閉學校，全世界超過 15 億學生無法在正常的教室環境中學習。⁵

這場“世紀大流行”的長期影響遠未分明。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等已經在世界各地激起了反全球化運動。疫情暴發自然給全球化的前景蒙上了新的陰影。新冠肺炎疫情不單是一場毀滅性公共衛生危機，而且暴露出國家治理和國際秩序的根本性問題。如亨利·基辛格所說，“許多國家的制度將被視為失敗”，

“新冠病毒後的世界再也不復以往”。⁶ 有理由認為，對區域和全球一體化的懷疑，以及激進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可能會在世界許多地方抬頭，導致人的心態、行為、偏好和側重點的改變。

考慮到這些情況，前面提到的中國藝術家黃永砅似乎企圖用他那富有想像力的藝術作品提醒觀眾，現代中國在與外部世界相遇的過程中經歷了急劇的變化和意外的曲折。他的雕塑每個細節都充滿豐富的含義。生於福建的前衛藝術家黃永砅在巴黎住了十多年，對一門心思追求現代化及對全球化導致的破壞性結果一直持批評態度。⁷ 在他和其他批評者看來，經濟與文化全球化蘊含著不同的意義和現象——並非全是正面的。⁸ 官員腐敗、經濟不平等、金融動盪、社會失序、環境退化、公共衛生資源分配不當、文化異化現象和國際緊張關係，這些問題是全球化進程的常見副作用，許多國家都有，中國也不例外。2000年，上海雙年展的一位策展人侯瀚如說，黃永砅的展品顯示了“走向現代、走向全球的夢想總是暗含著破壞與災難的風險”。⁹

黃永砅的警告有著深深的歷史原因。如哈佛大學歷史學家杜維明所說，“中國在現代轉型過程中目睹了太多的破壞和暴力”。¹⁰ 值得注意的是，黃永砅的作品以藝術手段表現了知識界對於全球化“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不可逆轉”論調的批判，這樣的批判聲音始終沒有平息。¹¹

對中國來說，真正的風險及它作為新興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政治風險，或國家重回國人心中那“兩個不幸的世紀”，即鴉片戰爭以後那段時間。改革開放後，中國從經濟全球化中獲益巨大，可以說甚於任何其他國家。國內市場改革與對外部世界的深度融入協同推進，造就了過去四十年的“中國經濟奇蹟”。

自鄧小平 1978 年開啟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中，中國大約 8 億

人脫離了貧困，相當於歐洲人口最多的德國的 10 倍。僅僅二十五年前，在中國還看不到明顯的社會和經濟層面“中產階層”的蹤影。但今天，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目前據計在 400 萬到 500 萬）過上了中產生活，有私人房產、私人汽車、良好的醫療保健、各種金融資產，還有財力出國旅行和送孩子出國留學¹²；早期，這些人主要集中於上海和其他大城市。2019 年 10 月，中國人民銀行對中國城市居民做了一次大規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 96% 的城鎮家庭擁有房產，其中 31% 有兩套房產，11% 有三套或三套以上。¹³ 與四十年前相比，中國 2019 年的 GDP 增長了 60 倍，人均收入高了 25 倍。¹⁴

中國現在面臨的嚴峻挑戰是，在迅速躍升為世界最大的中產國家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如何消弭其他國家，特別是北美洲、歐洲和大洋洲國家的恐懼與憂慮，打消它們關於中國地位上升和影響力擴大將損害地區乃至世界繁榮與和平的擔心和偏見。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開始重塑全球格局，一些由中國唱主角的新創金融機構，如絲路基金、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也起著同樣的作用。有些人認為，中國牽頭的這些倡議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急需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和更加有效的脫貧手段，其他人卻有不同看法。同樣，中國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也有了顯著增加，世界衛生組織即是一例。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在世衛組織的影響力進一步增強，這激起了世界各國批評者的強烈不滿。

最令人擔心的是，美國和中國之間緊張關係的升級。曠日持久的貿易戰，對彼此政治制度日益尖銳的批評，在涉台、涉港、涉疆問題上的針鋒相對，在東海和南海附近頻繁的軍事演習，在 5G 技術、人工智能、網絡空間和外太空領域日益激烈的競爭……這些都是緊張升級的表現。華盛頓越來越感到，美國有可能在戰略、外交、安全、軍

事、政治、意識形態、經濟、金融、科學、技術、衛生，甚至教育與文化等多條戰線上與中國發生重大衝突。華盛頓的一些政客和輿論領袖把教育與文化上升到“高端政治”（high politics）領域，將其變成了國家安全問題。由於這些關切，美國政界、外交界和學界中的許多人斷定，美國對中國長期以來的接觸政策失敗了。在各個領域與中國全面“脫鉤”的主張在華盛頓聲勢漸漲。

同樣，針對美國的敵對觀點在北京也日益普遍。對於在各種問題上與中國有爭端或批評中國的美國、其他西方國家及中國的鄰國，中國開始利用中國的經濟、技術和軍事力量對等應對。北京升級了國家主導的產業政策來打造“國家領軍企業”，還鼓勵在高科技領域與西方公司開展直接競爭。中國推行主動大膽的外交政策，其特徵是談到中美關係時最新的常用字“鬥爭”。

中美關係惡化的速度與規模前所未有，幾乎無人料到它來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廣。時不我待，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和中國這個迅速崛起的國家需要趕快找到辦法，防止彼此愈演愈烈的恐懼和敵意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那將導致兩國直接對抗，甚至是毀滅性的戰爭。如此可怕的前景似乎應和了中國一些人的悲觀情緒，已故的黃永砵（1954—2019）那件藝術作品正是表達了這樣的悲觀情緒。黃永砵通過他的雕塑突出了歷史的不可預測和紀念碑式的建築在不斷變化環境中的脆弱。不過，也許更重要的是，這件藝術品促使人們重新思考在我們岌岌可危的世界中全球一體化和文化交流的意義與價值。

在美中矛盾日益加劇，全球混亂、山雨欲來這一至為關鍵的時刻，美國決策者必須看到當今中國的充沛活力和巨大多樣性。上海所體現與引領的今日中國中產迅速增長造成的政治、社會、經濟、企業、文化和民間的改變。當然，中產當中盛行民族主義，有時甚至存

在強烈的反美情緒。但是，這個重要的群體也具有開放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敢於挑戰權威，要求政府盡責，而且非常樂意與美國和其他國家合作——他們中的許多人曾在美國和西方各國留過學。華盛頓不能低估中國中產的作用與力量，採取的政策不能排擠疏遠這支力量，將其推向強硬的民族主義，那樣對兩國乃至全球都是有害的。

當然，上海的未來並無定論。不過，研究它的過去、現狀和今後幾十年可能的變化方向給人啟示良多。作為 1949 年以前最西化的中國城市和當今中國融入世界的排頭兵，上海是理想的研究案例，可藉以評價跨國力量，以及文化與政治、國家與社會、東方與西方互動所產生的影響。

研究的核心是一個答案待定的問題：中產在塑造中國未來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方面將發揮何種作用？它會成為國內積極社會變革的催化劑、絆腳石，抑或是別的什麼東西？中產的快速增長一般會引發對未來的新期盼和責任感，它會推動中國在瞬息萬變的全球環境中成為建設性（而非破壞性）的力量嗎？著名國際事務評論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¹⁵ 最近說過，美國對中國的力量增長反應過度。若能充分了解中國中產的視角、價值觀和呼聲，特別是他們與西方同類人群的相似之處，能否幫助消解這種恐慌？

在中國繼續沿著自己的發展道路闊步前行之際，對這些問題的探索和解答意義極其重大。要想尋求答案，透過中國最有活力的城市——上海，來了解中產這個當今中國社會的核心組成部分是一個很有效的途徑。